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论析\*

赵 玲 徐华伟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消费资料无限丰富的社会,与人被物包围的消费社会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性,但新时代的中国无论在社会制度、消费动力还是本质特征上都有别于消费社会,从而注定了消费主义不是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在新时代,人民的消费方式已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换,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现实的消费条件、发展水平之间还存在差距。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既应当助力经济发展,又应当提供伦理批判、价值引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消费合宜性;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8)03-0047-07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已然步入结构调整与品质跃升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作为发展内在环节的消费,其表现、质量既为发展提供动力,也在相当程度上验证发展的样态和成败。如何处理好消费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并为改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作出不懈努力,是新时代消费合宜性追问的主旨。

## 一、新时代消费合宜性对消费主义的超越

笔者曾在《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一书中指出:“消费合宜性是消费上的一种道德理念与道德属性,是建立在平等的自由主体基础上的,以人的合理存在为价值依据,以适度为原则,以和谐关系的确立为目标的恰当的消费方式。”<sup>[1](p.55)]</sup>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消费合宜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其评判尺度在于需要的属性及实现条件的可行性。以此观之,无论是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是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为消费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来看,消费合宜性都必然面临变迁及转换的时代课题。

新时代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分别用“三个意味着”、五个彰显时代特征的排比句、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等表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及任务。这无不说明,新时代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的现实前提。“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sup>[2](p.28)]</sup>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关键环节,它既是第一个“一百年”的完美休止,又是庄重开启第二个“一百年”新乐章的新起点。唯有坚实而稳固的小康社会基础、全面而系统的小康社会内容、精彩而文明的小康社会底色,方有光明而壮丽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使命在客观上也昭示出全体人民不断追求并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从表象上看,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富裕社会,一个物质财富充分的社会,也是消费资料无限丰富的社会,与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种人被物包围的“消费社会”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sup>[3](p.1)]</sup>新时代寄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然也饱含着人民对美好消费生活的期盼;新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消费合宜性视阈中的共享发展理念研究”[16BKS064]、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创新创优基金“大众日常生活理念的精神文明话语体系研究”[NJ201700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成果。

作者:赵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华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在职博士。

代人民的消费生活必然受到关注,也必须完善消费结构、提升消费质量。这是对以往短缺经济时代条件下人民的消费水平长期低水平徘徊、美好的消费需要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且因“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而不得已维持于温饱型、生存型消费的重大变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当代中国无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消费条件,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新时代的中国要走西方消费社会的道路,也不能认为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要以消费社会的价值观——消费主义为内容。

首先,社会制度不同。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的存在方式重大变迁的结果。它从过去的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成为人被各种各样新奇而频繁涌现的物所包围进而大量进行消费的社会、人被物的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操控的社会。与之相应,消费主义是一种视消费为人生最高目的的价值观,主张消费是人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购物与消费,生活的根本原则就是物质享乐和娱乐消遣,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解决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需求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刺激消费、推动大众消费就成为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宝。借助广告、信用卡、福利制度等手段,资本主义撬动了横亘在民众心中的巨石,使新教伦理提倡的节俭、克制等消费理念被“即时行乐”“用过即扔”等观念所取代。在资本增殖这一逻辑的运作下,消费主义将成功、进步、美丽、时尚等符号内蕴于商品,诱发人们大量消费甚至浪费。从实质上讲,消费大众化、民主化虽然使工人阶级获得了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拥有了一定的购买能力,在消费领域获得了与资产阶级相似的某些权利,但“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sup>[4](p.8)</sup>它不过是资本实现增殖的手段。资本创设并激发虚假需要,凸显商品的符号价值,将工人阶级的视线转移到对商品无止境的消费活动中,从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及中国国情而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伟大胜利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庄严承诺的兑现,即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sup>[12](p.27)</sup>状态的实现。消费不仅关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最终体现人民生活殷实的程度,且后者相较于前者更为重要。故而,新时代的消费虽同样具有繁荣市场和驱动经济的功能,却并不服膺于资本的逻辑,不服膺于资本无限扩张的目的,而是服务于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在根本上,生产的目的是消费,

但社会主义的消费不是隶属于经济主义的齿轮,它体现着鲜明的人学目的论,并最终落实为人民的消费。反过来,人民的消费也不单纯是物的消耗,其真实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民通过消费,不仅使自身的生命力、“自然力”蓬勃向上,生理功能良性发挥,而且将蕴含在物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及内化,变成自己稳定的内在结构,使自己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都更加充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和人格保障。

其次,消费动力不同。消费源于人的需要,而需要又是动态发展的,具有无限性、递进性特征。需要和欲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和欲望又可演化为需求和欲求。美国学者贝尔曾比较了需求与欲求之间的差别,认为“需求来自生命本能——足够的食物,合适的住所和有效的卫生”,它“自有固定的限度”;而“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sup>[5](p.68)</sup>消费主义把引发人们消费的需求篡改为己求,因为欲求在主观上激发消费,为生产的无限扩大提供了“合理化”根据,其逻辑为:欲求→消费→生产→新消费→新欲求→更大规模的生产……欲求永无止境,消费与生产自然永不停歇,自然会“毫无悬念”地带来资本的增殖。资本通过流水线降低成本,通过发展市场,通过信用制度、广告的作用,又进一步刺激人们的欲求,使人们形成“炫耀习惯”甚至产生“不顾后果的浪费”。当然,仅有“欲求”是不充分的,消费只有与人的存在相联系,成为人们必要的生活方式,即“我买故我在”,才会成为人们不由自主的行为。

在新时代,消费的驱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满足这些需要只是手段,发展自己才是目的。他们不排斥享受需要,并且认为人类的历史应当是从满足生存需要到满足享受需要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他们提出的享受需要也不是享乐主义,而是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了更高的期盼,如何使人民拥有更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更优质的教育条件、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更放心的消费环境等,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内容。这些需要的满足及实现,既可以助力,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可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本质特征不同。“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结构。”<sup>[13](p.46)</sup>消费社会看似带来了消费的民主化,但是强调符号特征的消费主义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

新的等级观念。它表面上是“消费品”的档次区分,实际上是受资本控制的社会地位、阶层的区隔。这就使消费领域中的分层或分化表现得更为直接与特殊。因为除了受个人心理(如虚荣、示差、求同)因素支配外,对消费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有个体及家庭的收入分配状况。消费社会中的上层人士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用金钱建构起自己的独立王国,也将自己与普通百姓隔绝开来。消费社会利用价格这个“过滤器”将人与物隔离的实质,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消费社会虽然允诺了一个丰裕的时代、一个由物所堆积起来的梦幻时代,但消费品的充裕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领域的不公平。消费分化不过是社会分化的显性表达而已。

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6](p.373)</sup>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之计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政治承诺,新时代将扩大富裕的范围和主体,使富裕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追求幸福生活。新时代将扩展富裕的程度,使富裕不再是被平均的数字,而是经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硬仗之后使贫困县、贫困人口实现真脱贫、脱真贫。总之,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消费更加高质、全面、有品位、个性化,但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平均消费,也不意味着社会的收入分配没有差距、消费没有分层。而只是说,这种差距比较合理,消费分层没有演化为两极分化,呈现出积极的正向引导和激励功能。

综上,消费在新时代的地位虽然重要,却并不是突破资本增殖瓶颈的工具,也没有凌驾于人之上而使人异化为消费动物。换言之,新时代的中国在社会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都优于消费社会,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必然要摒弃消费主义。

## 二、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这两组数字比1978年有了数十倍的跃升。同时,恩格尔系数也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7年的29.3%,表明中国居民已达到富裕生活水平。此外,根据图1所示,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由改革之初

的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型,消费需求也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不过,当我们惊喜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际,也应当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还有递减的空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现实的消费条件、发展水平之间还存在差距,“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sup>[2](p.12)</sup>基于此,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应当提供伦理批判、价值引领,以发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功能。

### (一)以高质量的消费为高质量的经济提供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以往简单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自我革新。消费是经济发展无法绕开的重要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消费对生产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抽象变为现实,由无用变为有用,由非对象性变为对象性,使产品“最后完成”;二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sup>[7](p.15)</sup>消费为生产创造出“需要”,而“需要—消费—生产—(新的)需要”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当一个需要实现之后,会产生出新的需要,推动生产进一步延伸,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没有健康而有活力的消费,自然就没有经济增长,更奢谈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高质量的消费应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在于消费需要是各项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消费需要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的总量,消费结构的变动是影响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变动的根本因素,消费需要层次的上升是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因,更在于消费与民生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质量的跃升对其素质的养成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功能”<sup>[2](p.30)</sup>的观点,这说明高质量的消费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因而,合宜性消费应当引导人民将消费与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关联起来。必须指出,这里的高质量消费不是不顾自己收入状况的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也不是单纯追求高价格的虚糜性消费。

### (二)以高尚的精神文化消费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充实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sup>[2](p.40)</sup>当今时



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内核之一,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声望及国际影响力、感召力。新时代中国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部分,着力于提高文化软实力,方可在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不同意识形态相互较量,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业态文化形态的复杂局势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自身的文化色彩和内涵,促进社会主义繁荣兴盛。中国进而会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亮出文化名片,并在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近过程中逐渐形成与之相匹配的道德形象和精神气质。然而,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既以器物、形式、技艺为依托又不拘泥于此,一旦形成又会推动物质层面的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同时,精神文化需要作为人的内在需要、高层次的需要,也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在物质小康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民求真、向善、臻美的需要日益迫切,这就需要与之相契合的精神文化消费。高尚的、以发展为特征的精神文化消费能够使人在与物的沟通与理解中、对隐含在物中的智慧消化与吸收中激励人的心灵发生质的转变,进而自觉摒除低俗、愚昧、颓废、污秽的消费模式,自觉培育创新能力、思辨能力、鉴赏能力等,从而使人民的生活趋于美化,消费方式趋于文明,使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进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 (三)以绿色消费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近代以来,受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和辅佐的经济主义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类对前途充满了担忧和恐惧。日益紧迫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不断刺激着人类的神经,引发人类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谋求与自然休戚共存的长久关系模式。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在中国现代

化语境中的应有样态进行的哲学思考,也从人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中明确了生态消费、绿色消费的伦理原则。从消费的趋向来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是其固有属性。一方面,自然资源为人类的消费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是消费的对象,即使是各种被高科技加工改造过的消费品也依然打着自然的烙印;另一方面,人类消费所产生的各类废弃物不可避免地会被释放在自然界,且因不当使用及随意丢弃而导致的附带性后果最终会波及自然生态,对自然界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消费会产生危害而不去消费也是不可取的。作为合宜性的消费,绿色消费并不是不要人们消费,而是强调要将人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角度规范消费,以防止杀鸡取卵式的浪费行径对自然生态造成灭顶之灾。绿色消费突出资源的后续利用能力、生态的再生能力以及人的延续性等问题,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它将当代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后代人的美好生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凸显了代际公正的原则。总之,一个将自然生态考虑进来的现代化才有可能是有生命力、可持续的,一个将生生不息的自然资源的可享用性考虑进来的消费方式才会有美好生活的效度和信度。

### (四)以公平消费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筑保障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公平正义的具体内涵也有特殊的规定性。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最本质的制度属性。在财富的分配这个层面,公平正义并不是平均主义,因为后者会用惯性习惯和平均思维伤害到劳动者的正当权利,直至湮灭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公平正义自然隐含着分配的差异性、不均等性或一定限度内的差距,相较而言“贫”与“富”必然共存于这个财富分配的矛盾体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中国改革之初“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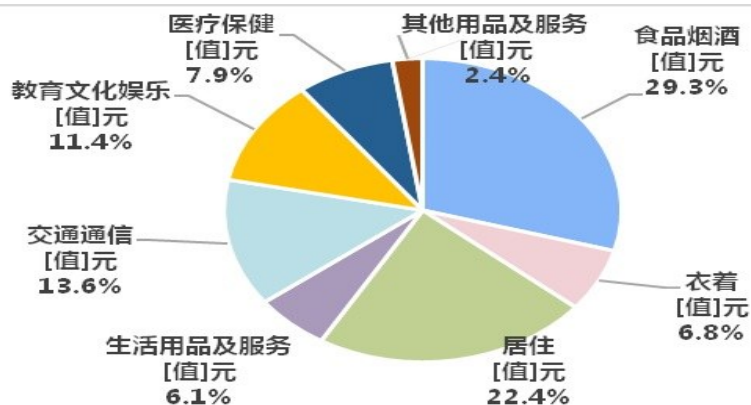


图1 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先富与后富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化成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至于一部分人民群众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从制度层面作了保障,使全体人民在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愈发接近,也使人民的消费向小康型、富裕型转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消费分化现象还相当突出。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其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富裕甚至是极富裕的水平,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还很低。而那些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阶层,往往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财富和成功,对其他社会成员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根据消费心理学,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高。如果收入差别过于悬殊,财富过分集中于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增长的收入又难以转化为现实消费,这势必导致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下降,造成市场需求不旺,影响经济进一步增长。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好这一难题,将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变得困难重重,也会使好不容易形成的良好发展态势出现偏差。公平消费是合宜性的消费,如果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如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够真正脱贫,且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会使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使中国智慧和方案熠熠生辉。

### 三、新时代消费合宜性的价值理念

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着眼于塑造人民的美好消费方式。这在根本上不同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从消费角度定义人的存在,将人视作消费者。“这个系统需要有人作为劳动者(有偿劳动)、作为储蓄者(赋税、借贷等),但越来越需要有人作为消费者。”<sup>[3](p.76)</sup>这个“消费者”强调对物的占有性,他对物的消费并非是要发展自己,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如美国学者弗洛姆所言:“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sup>[8](p.32)</sup>受消费主义塑造的“消费者”对劳动、工作极为鄙视,对殚精竭虑的奋斗精神极为排斥,对悠闲自得、安逸享乐、轻松愉快的生活却极为推崇。这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推崇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类型,更不符合美好生活的本质。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既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必然

要涉及经济与人、享受与发展、物质与精神等多种矛盾关系的协调和解决。从正确发挥消费的功能以及防范消费主义风险的任务而言,消费合宜性还应强调如下价值理念及规范。

#### (一)以人民为中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消费虽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消费的目的却是为了人民。由于消费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过它来透视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从消费情况可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把握当代中国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看到当代公民的精神气质、捕捉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甚至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干部清廉与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消费是一个棱镜,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时代人民不得已而抑制消费,着眼于有限而必要的消费,那么在新时代,为生存而消费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质量提升反映出人民为发展而消费的特征。因此,尽管新时代有充裕的消费品,消费却不是社会的中心,“人民”才是中心。新时代,人民购买更多、更好、更新的东西是要发展自己,而不是将自己沦为商品的奴隶。如果说刚打开国门我们还在惊诧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与富庶,惊诧于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消费领域存在着强烈反差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在今天已经明显缩小。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观念,激发了人们的欲望,使人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对人性的认可。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欲望一旦挣脱了理性的枷锁,就极有可能把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而使人变得为所欲为、物欲膨胀,变成没有目的性的存在物。恰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sup>[4](p.9)</sup>这实际上是人的异化,与美好生活相去甚远。消费的主体应当是人,是作为主体的人民。人民应当追求美好的消费生活,体验美好的消费生活,却绝不应仅从消费品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也绝不应为了消费而活,使自己沦为谋求感官快乐的消费动物。正确认识消费对人的发展的手段性价值,使消费为了人民而服务,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是消费合宜性首要和根本的理念。

#### (二)共享

从字面上讲,共享即共同分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美德论的意义上,共享是对自私和独享的超越。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理念,强调社会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独自享受的发展,而是

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的发展。这就注定了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具有深度,还要有广度与厚度,它应当是使人民有“获得感”而非“剥夺感”的发展。消费本身包含着对客观对象“享有”的成分,只不过这种享有不应当是外在于人的单纯占有或无目的性的浪费。人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人在消费中不仅要物及其内在的能量转化为自身的素质和机能,还要通过物中的能量提升自己的感觉、思维等主观要素,从而在对象化的世界中证实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人的消费是对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以及发展需要依次递进的满足,从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9](p.189)</sup>不加辨别地仅占有物品而不考虑自身发展性需要的消费毫无深度可言。从内容上讲,共享不应当只是物质上的量的累积,还应当包含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我们固然需要“仓禀实、衣食足”的小康生活来昭示共享发展的价值,但更需要人们“践礼节、知荣辱”,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这就对人们消费的层次、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共享不应当是独享,而应当包含如何与他人分享及合作的问题。消费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具有客观性、社会性。作为消费的对象——商品,是社会生产的必然结果。而从人的社会性本质来看,个体的消费不应当仅仅是个体的自我确证或自我任性,总会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他人、社会。人的消费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并且在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中才能真正实现。进一步说,人的消费,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生命的肯定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确证。只有这样,人才能在由人自身活动所创造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享用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的文明成果,展现出品位和质量越来越高、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才能使自己的规定性相应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还应当指出,共享发展并不否认消费分层,因为从共享的要义来说,既不是共同消费也不是平均消费,它的前提是劳动,不劳而获无法得到共享发展的资格,但若消费分层仅仅沦为有钱人任性、逍遥的身份标识,而贫困者生活窘迫,那么分层则有可能演变为分化,其不公平性便跃然而至。

### (三)和谐

笔者曾在解释“合宜性”这个概念时,将利益关系的和谐作为合宜性的目标。“合宜性的目标是要平衡分歧、冲突、矛盾,通过协商、平等对话、调节等方式来实现和谐,实现人的生存条件与生命质量的优化与美化。”<sup>[11](p.39)</sup>哲学上的“和谐”范畴,指的是事物和现象之

间多样性的统一,是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首先以差异性、多样性、个别性为前提,比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差异、差别只是表明了矛盾的存在,却并非表明事物之间是全然对立、冲突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事物之间的多元互补、多样统一,即共生共在性、相互协调性,是“各因素之中的”“协调一致”。<sup>[10](p.180)</sup>同时,和谐作为一种关系模式的哲学方法论,必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反对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处理人的社会性关系时,和谐反对“丛林法则”,而是强调“共赢”逻辑,主张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共同发展;而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反对工具主义思维方式,反对将自然仅作为资源来看待,主张在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消费合宜性对和谐理念的倚重,目的在于把人与自然看成“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快增加的人口及其日益扩张的需求量对地球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某种离奇、怪诞的需要,不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生态的可持续性。因此,和谐理念要求人们遵循生态规律、考虑环境因素,努力调节消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以适度的消费欲望、冷静的消费要求、健康的消费心理进行消费,使中国早日摆脱雾霾、重金属污染等重大生态风险。

### (四)节俭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中国消费思想史不乏关于节俭的箴言警句。比如《左传·庄公廿四年》中的“俭,德之大共也;侈,恶之大也”,《贞观政要·规谏太子》中的“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节俭观“通过提供神圣化终极意义(国家的远大理想和目标)来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感和神圣感,从而使使得清贫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sup>[14]</sup>换言之,节俭观延迟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在市场经济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信用消费、社会保障制度等条件为人们大量消费扫清了障碍,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反思以往节俭美德中的保守、落后成分,也应当反思将节俭作为甄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试金石的做法,反思重积累、轻消费的片面发展战略,但却不能认为我们不应再提倡节俭。殊不知,高质量消费与节俭精神并行不悖,节俭并不反对高质量消费,还会对高质量消费进行合理化、科学化的引导,使高“质”消费实



至名归,而不似消费主义那般为了“高”消费而使人沦为消费动物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非“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sup>[2](p.69)]</sup>如果陷入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泥潭将会贻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业。还应当看到,“消费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sup>[12]</sup>是西方社会兜售的意识形态,它以隐蔽而最形象的方式发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功能,在日常生活维度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2](p.41)]</sup>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主义,坚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这个时代的节俭并不是一种道德强制,不是禁欲、吝啬,不是节衣缩食,它体现着不畏艰难、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是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确立自己的生活需要,根据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而适度地节约资源,根据自己的真实需要而安排恰当生活方式,根据社会财富的公平享有而合理地支出。节俭紧扣新时代的脉搏,强调高质量消费与优质消费并存,即消费升级、结构优化与人民享受高度文明能力的提升相匹配;强调高品位消费与高品质消费共融,将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的理性能力与人的精神气质、道德责任有机结合,既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又促进人民素质提高。

曾几何时,我们在为“一分钱掰两半花”而费尽心思,也曾不得已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更无奈于统购统销、凭票购物的物资匮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飞跃的当代中国,物质短缺已不再是基调,“人被物包围”的场景已成为常态。新时代让人民感受到了真切的获得感,消费品种的多样化、消费类型的丰富化、消费选择的自由度等都在推动着消费合宜性的内涵变迁。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践行科学而文明的消费方式,要求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为高质量的经济提供动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充实内涵,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基础,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筑保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消费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的供给,低端、无效的供给要么窒息需求、萎缩消费力,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的持续动力;要么使需求外流,使本国消费市场流失,挤压国内经济与民族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样无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故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需错配,从供给层面为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升级提供条件,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高层次的消费需要。人民有足够的经济

实力才有可能有消费的意愿与能力。只有GDP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货币保值、实际购买力有机统一,才可能使人民有钱可花,才能使人民在满足生存型消费之后可以追求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当然,有钱想花也需要人民有钱敢花,这就需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不再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忧心,不再为教育、养老、医疗等消费内容而顾虑重重,才会使储蓄倾向下降,才会增强消费信心。从人民消费的质感来看,还需要注重精神文化产品的教化功能,依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以不断丰富文化活动为手段,为各阶层群众搭建文化平台,在提高其精神文化水平的同时,提高其文化鉴赏水平,培育人民群众自觉抵制不良文化影响的能力。针对消费领域中的不平衡现象,应当通过税收杠杆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矫正过高的两极分化,尤其需要将农村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释放出来。总而言之,消费合宜性作为消费生活的道德要求或道德属性,为人民构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有益指导,但按照唯物主义原理,消费合宜性若要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社会从制度供给、经济生产、技术进步以及文化变迁等层面给予支撑和配套,这将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

### [参考文献]

- [1]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王宁.从节俭主义到消费主义转型的文化逻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12]袁三标.资本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迷雾[J].社会主义研究,2017,(1).

责任编辑:涵 林

**Rebuilding the Collective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hile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rudimentary institution for rural manage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y. The collective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embodies socialis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rural management has long laid weight on continuous consolid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which lacks measures for a “centralized” village institution and mitigates the collective mechanism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lls for reinforcing th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renewing the collective mechanism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of integr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key to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rudimentary rural management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of fundamental rural institutions, uniting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rebuilding the collective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premise of an invigorated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Zhou Jian-ming)

**The Gridlock and Measures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Two Leaps” in Agriculture:**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Two Leaps” in agriculture scientifically uncovers the rule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and indicates appropriate scale of rural operation is fundamental to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hway selec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viewing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Two Leaps” in agriculture at present is sure to impose a profound importance on accelera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 agriculture has entered the phase in need of 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operational scale for production mode, namely a key stage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t calls for further modern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ocial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ng rural land system on the basis of Household-responsibility system, transforming from small-scale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to appropriate-scaled 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econd leap” in Chinese agriculture. We shall unswervingly stick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adhere to the pathway compatible with China’s situation, and furthe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s. (Chen Yu-ping, Ding Shi-jun and Sun Fei)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New Era: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entral Document No.1” in 2018:**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cluded it in the CPC’s constitution, which is an epoch-making milestone in working out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amely the “Central Document No.1 of 2018”, is beyond doub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new era. The document demonstrates strategic plann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ef social proxies, keeps in line with the fourteen “Central Documents No.1” in previous years, and puts forward new strategies, goals and requirements for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n a new era.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embracing and improving the CPC’s leadership. We shall thoroughly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e shall also religiously carry ou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entral Conference on Rural Work and the “Central Document No.1” in 2018,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well-grounded way, and compose a new chapt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new era. (Liu Xiao-xue)

**Conscientiously Following the Rule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emory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the last 40 years demonstrates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pathway for socialism and the rule of Chinese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Chinese socialist institution lies in the CPC’s leadership, whil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definitely established on the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a new era. The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calls for conscientiously generalizing and adhering to the rule of Chinese socialist development. (Zhang Xing-long)

**The Success of a Reform Depends on the Correctness of Its Guidance and Political Stance: An Article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chievement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es in our adherence to primary socialist institution,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to a socialist orientati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elf-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institution. Thus, it is wrong and dangerous to blindly focus on the reform itself with ignorance of its guideline and political direction. To promote a socialist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requires constant vigilance against a capitalist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o-liberalism. (Zhou Xin-che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CPC’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a New Era:** The CPC’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its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a new era has a clear-cut philosophy. Its value logic is chiefly exhibited through improving the general layout for party construction, further promoting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in an all-round way, and plann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s genitive philosophy is chiefly characterized by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ories for Marxist partie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reflecting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ts logic of development mainly demonstrate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rigidness and mildness”, “inside and outside” and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us, summarizing and studyi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a new era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our knowledge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its general layout in a new era. (Chen Shu-wen and Pang Kun-que)

**Upholding Socialist Values as the Key to Cultural Confidence: A Structure-Function Analysis:** Consolid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lies in building up the dominance of socialist values.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confidence in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Its essence refers to the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valu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We shall maximize the leading and integrating role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help people build up correct perceptions of history, state and the nation,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civilization of the people. We shall make communism as a common and highest ideal as well as people-centered modern values seize the cultural highland. We shall also stick to cultural confidence, “safeguard” core values and value borders with socialist values, deconstruct and criticize wrong thoughts which run contrary to socialist values. The adherence to cultural confidence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adapt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to safeguard socialist values. (Xuan Chuan-shu)

**On the Propriety of Consumption in a New Era:** The Chinese society in a new era, abundant with consumption goods, is to some extent similar to a consumer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re surrounded by materials. However, China in a new era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latter in terms of social institution, consumption motivation and essential characters, which makes consumerism improper in a new era. The new age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from survival to entertainment and self-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actual consumption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Thus, the propriety of consumption in a new era shall be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ic criticism and value guidance. (Zhao Ling and Xu Hua-wei)

**The Theory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duction Price and Its Role in *Das Kapital*: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0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 *Das Kapital* is an epoch-making classical work for proletariats’ political economy. Marx in this masterpiece predicted a series of key theor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hich is the sharpest theoretical weapon for the proletariat all over the world to fight for liberation. Since the theory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duction price plays a crucial part in *Das Kapital* and the Marxism as a whole, a reinterpretation of it impose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0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 (Li Cheng-xun)